

区域优势演变、产业地位变迁与差异化发展路径

蔡之兵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产业分工格局及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高度匹配。利用 2002 年与 2015 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可以从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地位两个视角对省域(含直辖市、自治区)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进行分析。在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影响地区产业份额变化的比较优势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 驱动不同省域产业分工格局变化的比较优势类型及其作用程度不尽相同。根据产业分工格局与三种区域比较优势的演变关系, 可以将不同省域划分为八种类型, 并根据其类型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键词】: 产业分工 区域优势 地理加权回归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 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然要求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及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高度匹配。本文拟从这一现实要求出发, 对我国省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特征开展分析, 并探寻这一分工格局和区域优势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一、引言与文献

从较长时期观察, 区域间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必然与区域优势的演变存在直接的关联。目前, 学术界围绕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区域优势的概念界定及其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区域优势是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独特优势, 是一种包含不同类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广义概念。按照形成时间的先后, 区域优势理论可追溯至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外部性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理论等, 后者则包括竞争优势及其一系列扩展理论¹。这些理论均认为区域产业发展应该与自身优势匹配。在静态视角下, 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优势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²; 在动态视角下, 当产业分工体系升级滞后于区域优势演变, 则会出现路径依赖从而阻碍区域发展; 当产业分工体系随区域优势演变而升级, 则会出现路径创造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¹⁾。

第二, 区域优势与产业分工格局关系的研究。

产业分工格局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地区间产业的空间布局结构与相互联系。在讨论区域优势如何影响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的文献中,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可区域优势包括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且两者是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关系。但是由于对竞争优势指标难以开展量化研究, 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主要落脚于区域比较优势而非综合性的区域优势概念。此外, 相关文献也

¹作者简介: 蔡之兵, 男, 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区域优势演变与高质量的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9CJY002)

指出区域优势影响产业分工格局的渠道主要包括企业发展成本、产业升级策略、产业政策、知识跨地区扩散⁽²⁾等四种类型，这些渠道通过影响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成本来影响不同地区的产业份额，并最终改变甚至重塑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

第三，衡量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的思路。

从现有文献看，绝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地区产业分工主题时，多运用各地产业在全国的绝对份额值来表征诸如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区位熵等指标⁽³⁾。这一思路的优势是数据容易获得，最终测算的指标也易于比较，弊端在于忽视了地区间产业的相互关系，且只用绝对值数据进行分析容易出现偏差。

从现有文献分析，目前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大部分文献在选取衡量区域比较优势的指标时只考虑要素数量、要素价格等会影响发展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对其他类型的比较优势关注较少，这不符合区域优势概念的综合属性。另一方面，在衡量产业分工格局时，绝大部分文献往往选择测量一个产业的绝对产值规模和相对产值份额，忽略了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讨论区域优势和产业分工格局的内涵与测量方法，对区域优势概念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将其解构为三种相对独立的比较优势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种比较优势的测量方法。同时，对产业分工格局的内涵以及测量思路进行介绍。第三部分以有统计数据的 30 个省域(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为观测对象，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第四部分则运用 GWR 模型对影响产业分工格局的比较优势类型进行识别。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将各个省域进行类型划分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区域优势与产业分工格局的内涵与测量

(一)区域优势的内涵与测量

1. 区域优势的内涵。

区域优势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从区域一般发展路径分析，对区域初始阶段发挥作用的区域优势往往是外生比较优势，如自然资源、交通区位、人口结构等。在区域发展水平提升到一定层次后，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对区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因素就变成了成本比较优势。当越来越多的区域发展水平上升，区域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外生比较优势和成本比较优势的作用程度就会逐渐下降。但是，受益于产业活动密度的增加，这一阶段规模比较优势的作用程度会提高。因此，从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区位比较优势、成本比较优势和规模比较优势分别在不同阶段对区域发展产生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不同阶段有不同类型区域优势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阶段下的区域优势完全不同。实际上，由于区域优势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始终是由不同类型的多种比较优势组成，虽然某一阶段会有某一种或者几种区域比较优势对区域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其他类型比较优势仍然会发挥作用。

2. 区域优势的量化测度。

第一，区位比较优势与地区在全国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变化相关，可以选择包括经济与地理信息的市场潜能 (market potential) 指标，测算公式如下： $mp_i = \sum_{j \neq i} Y_j / d_{ij} + Y_i / d_{ii}$ ，其中 Y_j 指的是地区 j 的 GDP； d_{ij} 指地区 i 与 j 之间的距离，用地图软件测量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衡量⁽⁴⁾； d_{ii} 是指各个区域经济边界到其自身中心的距离，根据 $d_{ii} = \sqrt{\text{面积} / \pi}$ 测算⁽⁵⁾。第二，成本比较优势可以用绝对成本比较优势与相对成本比较优势的均值进行衡量，其中，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用区域内部的劳动力工资进行衡量；相对成本比较优势用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变化进行衡量。根据林毅夫的思路，可以用基于技术选择指数的要素结构偏离度指标进行衡量⁽⁶⁾。第三，规模比较优势反映地区产业规模及由此引发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关联经济，以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予以衡量⁽⁷⁾。

(二)产业分工格局的内涵与测量

产业分工格局指的是各省不同产业在全国该产业中的绝对和相对地位。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常用的对区域产业分工格局进行计量分析的数据基础。本文主要运用省外流出这一指标分析不同地区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具体思路是：用某省域某产业向省外流出的规模占该产业国内总流出规模的比重，来反映该省域此产业在全国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在我国统计数据体系中，国家和单个省域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是按时公布的，目前共发布了 1992 年、1995 年、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2015 年、2017 年等 11 张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投入产出以及延长表。但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无权威发布来源，学界往往通过测算省级贸易流量矩阵和省级区域投入产出表来编制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我们同样根据这一思路得到 2002 年与 2015 年有统计数据的 30 个省域的 42 个产业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三)区域优势演变与产业分工体系质量的关系

从基本逻辑分析，区域优势演变与产业分工体系质量的一般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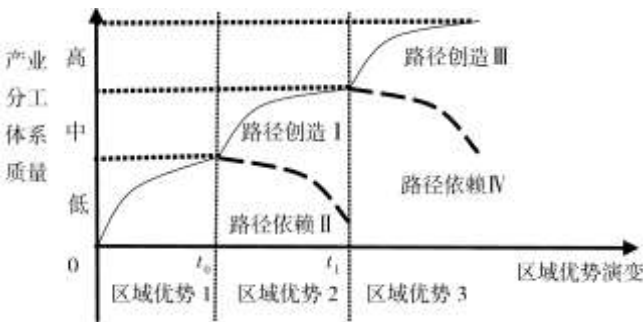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优势演变与产业分工体系质量的关系

图 1 表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区域优势的演变会影响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质量。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个体区域的产业结构演变都应符合区域优势的演变规律。如果个体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演变无关，那么整个区域内部的合理产业分工关系可能就无法形成。因此，可以据此来设计分析产业分工体系质量的思路，即通过对单个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的演变关系进行分析，并由此判断整体区域的产业分工体系质量。

三、我国省域产业分工地位的演变特征

在对区域优势与地区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关系展开研究前，首先需要对各省域在全国产业网络体系中的地位演变情况进行分析。

(一)2002 年与 2015 年省域不同产业绝对优势地位的演变

根据 2002 年、2015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省外流出规模指标的绝对值情况，可以得到 2002 年和 2015 年不同产业的地区分布情况，结果如下：

第一，2002—2015 年省域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42 个产业份额排前 5 位的省域分布格局都发生了较大改变，个别产业份额排前 5 位的省域分布格局甚至全部调整。

第二，在 2002 年的产业分布格局中，位居各产业份额第一超过 5 次的省域分别是浙江(7 次)、北京(6 次)、广东(5 次)。2015 年位居各产业份额第一超过 5 次的省域分别是江苏(9 次)、北京(5 次)、广东(5 次)。此外，在 2002 年 42 个产业的前 5 位份额地区中，出现的次数都超过了 10 次的省域是上海(18 次)、江苏(18 次)、浙江(18 次)、北京(16 次)、山东(15 次)、广东(14 次)。在 2015 年 42 个产业的前 5 位份额地区中，上海(19 次)、北京(16 次)、江苏(15 次)、广东(15 次)、浙江(15 次)都超过了 10 次。

第三，从具体地区的产业排名看，黑龙江、四川、河南等省在农业分布格局上具有较大优势地位；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在制造业上具有较大优势地位，其中，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产业的分布格局中，广东和江苏两省具有较强的优势地位，两者包揽了这些产业的第 1 名且都在前 5 名以内；北京与上海两市在服务业分布格局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地位。

(二)2002 年与 2015 年省域不同产业相对优势地位的演变

进一步，利用 2002 年和 2015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省际调出指标的构成结构数据，可以得到某地区某产业在全国的相对优势地位情况，结果见表 1。

表 12002—2015 年省域产业相对地位演变的总体情况

地区	变化情况		地区	变化情况	
	上升产业个数	下降产业个数		上升产业个数	下降产业个数
北京	20	22	河南	35	7
天津	23	19	湖北	17	25
河北	19	23	湖南	23	19
山西	18	24	广东	15	27
内蒙古	27	15	广西	15	27
辽宁	25	17	海南	22	20
吉林	7	35	重庆	19	23
黑龙江	27	15	四川	21	21
上海	21	21	贵州	26	16
江苏	19	23	云南	24	18
浙江	20	22	陕西	25	17
安徽	30	12	甘肃	26	16
福建	13	29	青海	9	33
江西	16	26	宁夏	22	20
山东	13	29	新疆	17	25

由表 1 可知：产业相对优势提升个数最多的省域为河南省(35 个),最低的省域为吉林省(7 个);产业相对优势下降个数最多的省域为吉林省(35 个),最少的为河南省(7 个)。此外，产业相对优势提升个数超过 21 个(含 21 个)的省域有 15 个，产业相对优势下降个数超过 21 个(含 21 个)的省域有 17 个。

从 42 个产业相对份额变化幅度之和这一指标分析，包括安徽、河南、江苏、内蒙古、辽宁、湖南、上海、天津、陕西、贵州、黑龙江、甘肃、广东、云南、海南、宁夏在内的 17 个省域总体产业相对份额是上升的，其他 13 个省域的总体产业相对份额则是下降的。

从单个省域总体产业相对份额变化情况看，安徽、河南、江苏、内蒙古、辽宁、湖南等省域的总体产业相对份额提升幅度位居全国前 6 位，山东、河北、吉林、浙江、青海、北京等省域的总体产业相对份额下降幅度位居全国前 6 位。可以发现，全国地区产业相对份额分布格局与绝对份额分布格局具有较大甚至截然不同的分布规律，如北京在 2002 年和 2015 年产业绝对份额分布格局中，其产业份额位于前 5 位的产业个数都超过 10 个，但是在相对份额分布格局中，北京的总体产业相对份额下降幅度则是全国第 6 位，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这说明，我国各地区产业分布的整体变化和个别产业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背离。

(三)省域产业分工相对优势格局演变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地区产业分工相对优势格局的演变趋势，我们分别从“产业—地区”和“地区—产业”视角对上文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从“产业—地区”视角对产业分工相对优势格局的演变分析看：

第一，从整体视角分析，按照在产业相对份额提升前 6 位顺序中出现的次数排序，河南省以 21 个产业进入前 6 位，居所有省域第一位；随后依次是安徽省(19 个)、上海市(17 个)、江苏省(16 个)、辽宁和内蒙古(各 14 个)、天津市(13 个)、广东省和北京市(各 12 个)以及重庆市(10 个)。其他省域相对优势提升幅度进入前 6 的产业个数均低于 10 个。

第二，从首位排名次数的角度分析，在 2002—2015 年 42 个产业相对份额提升幅度第 1 的位置中，江苏省占据了 9 个席位，广东省占 5 席，北京市、河南省、安徽省和黑龙江省各占 3 席，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各占 2 席，其他包括湖北省、福建省、陕西省、重庆市、天津市、吉林省、四川省、山东省在内的省域各占 1 席。

第三，从区域角度分析，在 252 个产业相对份额提升前六的位置中，东部地区占据 106 席，占比 42.1%;中部地区占据 61 席，占比 24.2%;东北三省占据 26 席，占比 10.3%;西部地区占据 59 席，占比 23.4%。可见，即使是在全国地区产业分工动态演变格局中，东部地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东北三省保持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不仅落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也有较大的距离。

从“产业—地区”视角看，一方面，各省产业相对优势地位下降幅度前 5 位的产业分工格局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分工格局可能处于高度集聚过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 30 个省域的前 5 位下降幅度产业类型中，只有河南、安徽、浙江、黑龙江、内蒙古与河北等 5 个省域的前 5 位下降幅度产业类型不包括服务业，其他 25 个省域的前 5 位下降幅度产业都包含 1 种或多种服务业，这就意味着服务业的分工格局目前处于多数省域份额下降而少数省域份额上升的阶段。另一方面，从产业份额上升幅度前 5 位的产业地区分布分析，我国的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仍然集聚在部分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地区间转移。实际上，绝大部分位于地区产业相对份额上升前 5 位的实体产业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业、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煤炭采选产品业、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等靠近制造业上游的产业。而在通用设备业、专用设备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业、仪器仪表业、其他制造产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只有广东、江苏两省在 2 个及以上的产业上实现了地位提升，其他包括河北省、吉林省、上海市、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在内的 13 个省域仅仅只有 1 种产业的地位得到提升。

四、影响省域产业分工格局演变的比较优势因素识别

在对我国地区产业分工格局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后，进一步探讨影响地区分工格局的比较优势类型，不仅对我们理解单个区域和整体区域的发展质量具有意义，而且可以为制定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一) 研究思路与分析模型

影响地区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类型包括成本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同，这些比较优势对产业分工格局的影响渠道和程度也不相同，故在分析不同类型比较优势对产业份额的影响时，采取能够估计不同地区相同变量不同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进行估计，其式为：

$$Y_i = \alpha_0(\text{long}_i, \text{lat}_i) + \sum_{k=1}^M \alpha_k(\text{long}_i, \text{lat}_i) x_{ik} + \varepsilon_i, i = 1, 2 \cdots N, k = 1, 2 \cdots M,$$
 其中 long_i 与 lat_i 分别表示 i 区域的经纬度数据即地理信息， $\alpha_k(\text{long}_i, \text{lat}_i)$ 则表示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区域经纬度的函数， $\alpha_0(\text{long}_i, \text{lat}_i)$ 为解释变量对应的截距项，本文被解释变量 Y_i 代表产业的相对份额变化，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成本比较优势 (CCA)、区位比较优势 (LCA)、规模比较优势 (SCA)， ε_i 为模型扰动项，反映空间随机效应水平。各省域三种比较优势演变的测算结果见表 2。

表 2 1998—2015 年省域比较优势的演变结果

比较优势演变情况	成本比较优势	规模比较优势	区位比较优势
北京	9.76%(削弱)	-30.09%(削弱)	11.11%(增强)
天津	1.18%(削弱)	-32.17%(削弱)	8.02%(增强)
河北	-4.96%(增强)	-12.44%(削弱)	6.42%(增强)
山西	-15.22%(增强)	-37.28%(削弱)	15.08%(增强)
内蒙古	-6.55%(增强)	-11.64%(削弱)	-12.14%(削弱)
辽宁	-4.97%(增强)	-11.91%(削弱)	-37.14%(削弱)
吉林	-5.65%(增强)	-10.22%(削弱)	-43.55%(削弱)
黑龙江	-8.27%(增强)	-22.01%(削弱)	-38.28%(削弱)
上海	4.72%(削弱)	-27.16%(削弱)	13.55%(增强)
江苏	2.35%(削弱)	8.66%(增强)	-6.09%(削弱)
浙江	5.77%(削弱)	30.14%(增强)	2.45%(增强)
安徽	-7.78%(增强)	37.81%(增强)	45.16%(增强)
福建	1.25%(削弱)	12.98%(增强)	11.44%(增强)
江西	-8.09%(增强)	11.74%(增强)	8.91%(增强)
山东	2.45%(削弱)	14.22%(增强)	-12.45%(削弱)

河南	-3.15%(增强)	-11.66%(削弱)	15.71%(增强)
湖北	-0.56%(增强)	3.53%(增强)	15.09%(增强)
湖南	-2.58%(增强)	9.12%(增强)	12.14%(增强)
广东	9.11%(削弱)	5.11%(增强)	-16.67%(削弱)
广西	-5.67%(增强)	-12.91%(削弱)	-17.78%(削弱)
海南	-6.09%(增强)	-40.19%(削弱)	-8.56%(削弱)
重庆	-7.09%(增强)	22.44%(增强)	47.79%(增强)
四川	-8.23%(增强)	1.19%(增强)	2.45%(增强)
贵州	-2.56%(增强)	22.33%(增强)	66.36%(增强)

(续表 2)

比较优势演变情况	成本比较优势	规模比较优势	区位比较优势
云南	-1.67%(增强)	-9.23%(削弱)	28.49%(增强)
陕西	-2.58%(增强)	4.45%(增强)	16.50%(增强)
甘肃	-5.13%(增强)	-11.14%(削弱)	-7.19%(削弱)
青海	-7.91%(增强)	-16.55%(削弱)	17.31%(增强)
宁夏	-2.03%(增强)	4.54%(增强)	4.44%(增强)
新疆	-4.24%(增强)	-2.15%(削弱)	3.88%(增强)

基于表 2 可以发现,我国省域比较优势的演变呈现出如下趋势。第一,从演变方向分析,1998—2015 年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的省域有 8 个,增强的 22 个;规模比较优势削弱的省域有 16 个,增强的 14 个;区位比较优势削弱的省域有 10 个,增强的 20 个。第二,从 3 种比较优势的平均变化幅度比较分析,成本比较优势平均下降了 2.81%,规模比较优势平均下降 3.69%,区位比较优势平均上升 5.08%。第三,从区域结构分析,成本优势削弱的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成本优势增强的区域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区位优势增强的区域以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居多,位于边境的地区区位优势下降趋势明显;规模比较优势增强的地区呈现区域内部分化特征。

(二)地理加权模型的估计结果

考虑本文的产业包括 42 种,故以 42 类产业系数回归值的均值作为 3 种比较优势的估计结果^⑧。估计结果表明,第一,2002—2015 年间,成本比较优势作用程度提升的省域有 18 个,下降的 12 个,其中,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域包括湖南、四川、贵州、甘肃、宁夏、安徽、内蒙古等,下降幅度较大的省域包括广东、北京、辽宁等。第二,2002—2015 年间区位优势作用程度提升的省域有 19 个,下降的 11 个。其中,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域包括河北、湖北、河南、湖南、四川、北京等;下降幅度

较大的省域包括山西、甘肃、青海等。第三，2002—2015 年间规模比较优势作用程度提升的省域有 12 个，下降的有 18 个。其中，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域包括广东、吉林、黑龙江、天津、上海、江苏等；下降幅度较大的地区包括北京、江西、河北、云南等。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比较优势作用效果的空间分布格局，见表 3。

表 3 比较优势作用效果变化的省域分布特征

类型	地区	类型	地区
成本比较优势作用增强	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成本比较优势作用削弱	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区位比较优势作用增强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新疆	区位比较优势作用削弱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广东、海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规模比较优势作用增强	天津、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东、重庆、新疆	规模比较优势作用削弱	北京、河北、山西、吉林、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三) 基于估计结果的省域类型划分

基于表 3, 可以根据成本比较优势作用增强、区位比较优势作用增强、规模比较优势作用增强以及成本比较优势作用削弱、区位比较优势作用削弱、规模比较优势作用削弱等 6 种变量变化方向，将 30 个省域产业分工与区域优势的演变关系分为“强强强”“强强弱”“强弱弱”“强弱强”“弱弱弱”“弱弱强”“弱强弱”“弱强强”等 8 种类型，见表 4。

表 4 省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的演变关系格局

类型	地区
强强强	内蒙古、河南、重庆、新疆
强强弱	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强弱弱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强弱强	黑龙江、安徽
弱弱弱	山西、吉林、福建、海南
弱弱强	广东
弱强弱	北京、山东
弱强强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天津

可见，在我国省域产业分工地位与区域优势演变关系格局中，处于“强强弱”这种匹配关系的省域最多，共有 8 个；“弱强强”类型的省域有 5 个；“强强强”“强弱弱”“弱弱弱”等类型的省域都是 4 个。此外，“强弱强”“弱强弱”类型的省域各有 2 个，而“弱弱强”类型的省域仅广东省 1 个。

五、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推动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产业体系和结构与区域优势的演变关系，出台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一，“弱弱强”与“弱强强”地区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龙头，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弱弱强”与“弱强强”类型地区数量不多，只有 6 个省域，其中“弱弱强”类型省域更是只有广东省 1 个。这类省域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在成本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开始削弱的背景下，地区产业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加速集聚的状态，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内部的发展体系已经能够为地区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而不需要完全依靠外部因素来推动，这也意味着对这些地区经济发挥主要作用的比较优势，是内生竞争比较优势而非其他的外生比较优势。因此，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一方面，需要继续稳固并提升自身发展质量，为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这些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和解构分析，探寻推动这些地区内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与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引领示范和借鉴。

第二，“强强强”与“强弱强”地区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动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并尽早制定培育内生比较优势的规划和政策。

与其他类型地区相比，“强强强”与“强弱强”地区目前正处于比较好的发展轨道，并位于东部之外的东北、中部和西部区域，这对平衡区域间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些区域，一方面，应该有意识地为“强弱强”区域补足短板，进一步提升该类型区域的综合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多动力。另一方面，应该未雨绸缪，在区域比较优势仍然发挥正向作用的阶段就开始谋划培育内生竞争优势，以更好更快地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区域发展是一个周期兴衰过程。在区域发展的起步期，包括成本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可能都在发挥作用；当区域发展进入成熟期，这些比较优势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比较劣势。

第三，“强强弱”地区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突破口，需要尽快找出制约比较优势发挥正向作用的因素并予以加强。

在所有不同类型的地区产业与区域优势演变关系类型中，处于“强强弱”的省域有 8 个，其数量是所有类型中最多的。这充分表明，该类型的省域可能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典型区域，这些省域遇到的问题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对这些地区而言，虽然成本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的作用效果都在提升，反映经济产业集聚程度的规模比较优势作用效果却在下降，这暗示其发展可能遇到了某些问题。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探寻导致这些地区在大量比较优势提升背景下所遇到的发展问题和潜在威胁，并对其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与“弱弱强”与“弱强强”地区进行比对研究，以制定出符合各地实际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个体区域和整体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强弱弱”与“弱强弱”地区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两翼，应该运用解决“落后病”与“失速病”的专门性区域政策工具提升两类地区的发展质量。

虽然“强弱弱”与“弱强弱”地区的结构类似，但是从省域构成分析，“强弱弱”与“弱强弱”地区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

地区。前者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后者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这两类地区面临的问题表面类似而实质截然不同，前者面临的是“落后病”而后者面临的是“失速病”。两者的共同点是区域经济增速较低、产业动力不足和要素流出；两者的不同点在于，“落后病”表现的是这一区域发展相对较慢，“失速病”表现的是区域曾经达到过较高发展水平后陷入发展失速境地。这两类区域的发展问题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比如，我国部分西部尤其是西北区域的发展动力匮乏。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专门的区域政策工具，对区域病的形成原因以及所需差异化的政策条件进行全面分析，鼓励该类型地区结合自身禀赋去探索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增强该类区域的发展实力。

第五，“弱弱弱”地区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短板，应该针对这些地区尽快出台系统、精准、更有力度的区域发展战略。

“弱弱弱”地区意味着成本比较优势、区位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正向作用都在下降，反映出整个地区的发展可能陷入了某种系统性发展困局。单一或者普遍化的区域政策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可能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应该针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禀赋与不足出台系统、精准、更有力度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仅仅依靠区域政策可能是不够的，交通政策、公共产品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都必须综合配套使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高这些地区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提升这些地区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并最终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注释：

1 李宜航：《劳动力技能分布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基于中国省份细分产业数据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2 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

3 贺灿飞：《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地理研究》2018年第7期。

4 毛琦梁、王菲：《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空间关联：知识扩散的作用与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1期。

5 吴雪萍、赵果庆：《中国空间基尼系数：测算、改进与趋势》，《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3期。

6 直辖市用市政府所在地作为地标。

7 程名望、贾晓佳、仇焕广：《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8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

9 谢富胜、高岭、谢佩瑜：《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10 估计结果从略。